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亡灵祭坛】	王佩英，让英雄名字如青铜长久	王友琴
【往事非烟】	试论文革中人性的恶与善——以北京大学为例	舒 声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四）	王复兴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亡灵祭坛】

王佩英，让英雄名字如青铜长久

• 王友琴 •

王佩英，1915—1970，河南省开封人，北京铁道设计院幼儿园保育员。文革前她批评毛泽东的方针政策并要求退出共产党，1965年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文革中精神病院把她送回工作单位关押。1968年她在食堂呼喊“打倒毛泽东”，被逮捕。1970年1月27日，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王佩英是文革受难者，也是文革中的反抗英雄。回看历史，文革中前一种人非常多，后一种人非常非常少。这一特征是和文革的残酷性紧密相关的。残酷的迫害导致了千万人的死亡，而反抗者刚刚站出来还未为人所知就已经被击倒杀害。

1970年1月31日，毛泽东写了“照办”两个字，正式发出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全国性的“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由此正式开始。这个“运动”是文革的迫害高潮之一。其重要特点是由当时在军队管制下的公安机关来进行逮捕、判处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和之前由所谓“革命群众组织”进行迫害和杀害有所不同。

王佩英在1968年已经被抓进公安机关，1970年1月27日，她在北京当时最大的聚会场所工人体育场（可容纳近十万人）受到“公审”，随即被宣判死刑并且“立即执行”。她和同时被宣判的人成为“打击反革命”运动在北京的第一批受难者。之后，北京市还继续枪毙了几批“反革命犯”。

一名年轻人在北京旧书市场上买到一份资料，提供给笔者。这是在判处死刑以前，发放到北京每个工作单位组织“群众讨论”的资料。这种在“判决”前组织的所谓“群众讨论”，实际上是强迫群众接受对这些“现行反革命犯”处以死刑。这份资料上关于王佩英的段落如下：

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五十四岁，河南省人，系地主分子，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

王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机关食堂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中呼喊反动口号，极其恶毒地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王犯在押期间仍坚持与人民为敌，疯狂地咒骂我党，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

把王佩英判处了死刑的，就是这些“反革命活动”。

和文革时期的其他判决书一样，王佩英的“反革命标语”和“反动诗词”是什么内容，她怎么“极其恶毒地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不告诉普通群众的。这种内容当时被称为“防扩散材料”，其实是怕人们发生共鸣。普通群众只能附和帮腔：“枪毙枪毙”，“同意同意”。

和文革前的判决书不同，在文革前死刑判决上写有不服判决可以在某个日期内向最高法院申诉。文革中最高法院停止工作，在“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的文件中明文宣布了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的新政策。王佩英在宣判的当天就被枪杀。

一位父亲在文革中受难的教师给了我王佩英的第三个儿子张大中的电话号码。我和张大中先生联络。张大中给我讲了他母亲的故事——

我的母亲王佩英，生前在铁道部设计院幼儿园工作。我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是流亡学生，在开封认识了我母亲并结婚。母亲是当地一个富裕商人的独生女儿，在开封“静宜”女子中学毕业。这是一个天主教会学校。（注：这个学校由美国修女创立，1948年创始人去台湾继续办学。现在台湾有同名的“静宜”大学，英文名字是 Providence University。）父亲在抗战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带着母亲先到郑州再到北京，在铁道部当科长。1960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七个孩子过活。从1963年开始母亲写一些东西，批评毛泽东。1965年她要求退党。工作单位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父亲去世后，按照规定补助了一年工资。母亲的工资是每月50元。她带着7个孩子，确实很难，有时候会心情不好。但她平常是正常的。她和家人谈论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都是正常的。我也看过母亲写的诗。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打油诗”。不能说那些诗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诗，但意思是通顺的，逻辑也不混乱。

1965年，我每个星期天去安定医院（注：北京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在回龙观的病房探视。母亲还经常写。她说她光明磊落。她寄出去，寄给党中央。她表达了她的不满。我那时候不太懂，只是觉得恐惧，还觉得不光彩。

在医院里，有一次，她说让我们兄弟姐妹去照一张照片，“让我看着你们”。我们就一起去照了相。还有一次，也是在医院里，她跟我说：“儿子，我罪很重，以后可能连累你们。”我当时没有当回事，只跟她说，您别说这些，好好养病。那时候我上中学。

文革中，康生（注：职位最高时是中国第四号人物）有一个专门对精神病人的批示，说对“精神病人要具体分析”，意思是精神病人中有反革命。1968年，安定医院把母亲赶了出来，宣称她没有精神病。他们要母亲工作单位把她领回去。单位里把她关进“牛棚”

（注：文革中，在各个工作单位都设立了监狱，专门关押那个单位里的“牛鬼蛇神”——毛

泽东用这样一个指意不明的词来称呼文革的打击对象。这种特别的监狱后来因此被称为“牛棚”——这个词的本意是乡村里真的牛过夜的地方。）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母亲。

文革后，我走访了和母亲一起关“牛棚”的人。一位俄文翻译，两位老干部，和我母亲在一个屋子里关过三个多月。她们讲了她被抓走那天喊了什么，被打成什么样子。她们也说到“牛棚”里的一些细节。她们说，在那里每天干“造反派”派给的活儿，我母亲干得麻利、专注。清理炉渣，她把没烧透的煤核都捡出来再烧。倒腾大白菜，她把白菜码得平平整整，还找来长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那时候她们的工资都被扣，只发很少一点钱，而且在食堂吃饭不许买肉菜只许买素菜。可是我母亲为了省钱，连素菜都没有买过，天天窝头咸菜。她告诉她们她想念家里的孩子们，特别想念我小妹妹，也是我家唯一的女孩儿。她们说我妈妈是个神志健全心地善良的女人。

她们说，我母亲在“牛棚”里写了一些小纸条，出去劳动的时候散发了。“造反派”发现后，闯进“牛棚”就把她按倒在地，拳打脚踢，毒打完又逼她“交代反革命罪行”。但是她一声不吭。她们劝她别写了，那没有用。她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会出去。（意思是我不会出去了。）她们说，我母亲是“宁死不屈”。

1968年10月1日，“牛鬼蛇神”被押到食堂。饭堂里人很多。我母亲站到人前，大声地说出：“打倒毛泽东”。一帮“革命群众”涌过来，把母亲打得昏死过去，又送公安局。此后没有任何手续，在公安局关了一年四个月。

1970年初，我哥哥的单位在北京修地铁，说单位里讨论反革命名单，有她。那时候把这种材料发到每个单位“教育”大家，老百姓有多大怨言也不敢说。我妈妈1月27日判决，立即执行。我那天晚上6点才知道。在马路边上，听到参加了会的人们议论：工人体育场……公审大会……死刑……。街道委员会把死刑判决书贴在我们院里，白纸黑字，上面还有红勾勾。

三个月后，有个人到家里来，说是法院军管会派来的，拿了一张纸，要签字。我哥哥签了字。他说了没几句话就走了。印象里这个人穿戴不太整齐，随随便便的。他拿来的那张纸给我们看了，没有留下副本。是不是判决书？没有给家人送过判决书。那是一份表格似的東西。

1977年，我为母亲申诉。母亲说的那些话，写的那些东西，确凿无疑。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真的，喊口号也是真的，“打倒毛泽东”也是真的。但是她曾经被送进过精神病院也是确实的。后来就以“精神病不能承担刑事责任”为理由，1980年给我母亲平了反。

——一张大中母亲的生和死，透过几十分钟的讲述，用以上近两千字写了下来。尽管我已经听到和写下了上千受难者的悲惨故事，依然感到透不过气来的压抑和难过。我不知道说别的什么才好，只是告诉张大中：我这里有你母亲的材料。

在那份从旧书摊子找到的材料上，印有20名“现行反革命”的“罪状”。王佩英的编号是十一。她确实写过反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诗和文章，但材料中说她散发了一千六百份“反动”传单，这数量显然被夸大。然而即使在这个已经大大夸张事实的判词里，书写“反动”文字也只是她唯一的“罪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在中国古代，只有杀人和谋反才判死刑。二者都非王佩英的罪状。在斯大林1930年代的“肃反”中，几百万人被送去“劳改营”，他们的“判决书”上写着“根据法律第58条第一或者第二或者第三……款”作出判

决。“打击反革命”运动中判决死刑却不援引任何法律条文。至于惩罚标准，在纳粹德国，集中营的规章说：任何人在书信或别的文件中诋毁国家社会主义党或者政府元首者，禁闭两星期和鞭打25下。文革的严厉和残酷是空前的。

在法律程序方面（在法律上“程序”是特别重要的），对王佩英根本没有开庭审理，哪怕是装样子的审理都没有过。她被判处死刑，不能上诉。而上诉的权利在中国古代是有的。她被处死，家人没有得到通知也不能去告别，她也不能留下遗言。而在中国古代，正史上记载，秦朝的李斯在刑场上怀念带黄狗打猎的好日子。历史小说中华佗医生把他的著作托付给了狱卒。戏剧中有窦娥在被处死前宣称上天将六月降雪以证明她蒙冤。在张大中的母亲案里，这些权利全都没有。“打击反革命”运动在中央文件的统一指导下在全国进行。因言论可以判处死刑，判死刑后不准上诉立即执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不通知家属，不发给家属判决书，北京上海全国都一样。这个“文化大革命”如此彻底，不但把几千年来死刑的定罪标准改变了，还把死刑的判决程序改变了，并且把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改了。

王佩英是一个幼儿园的保育员，也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人，这本来是每个人生来应有的权利。然而，在不准批评权力当局不准批评最高统治者的年代，一个有不同声音的人就成了“精神病”人；在法制不存、暴力肆虐、迫害横行的文革中，死刑更进一步成为对持有不同声音者的最“方便”和彻底的“解决”方式；即使在文革被否定之后，也只能以“精神病”为理由得到平反，而不是明晰宣布：要有言论自由，不能以言论治罪。

实际上，今天我们连她的言论都无从得知。除了“平反书”和判词，看不到关于她的档案资料，也看不到她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的诗文。这场革命的后果是如此干净彻底，后人既不知道受难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遭遇，更不知道他们的思想。

我没有真的见到过像张大中的母亲这样勇敢而坚定的人，也不能确定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可能起到什么作用。我和我的母亲讨论了张大中的母亲。我的母亲则很肯定地说：文革时期，无数人受到迫害，已经是非常恐怖，而且，听不到任何人敢对文革做任何道德上的法理上的哪怕是很小的批评，更是令人在心理上绝望。假使那时候她能听到张大中母亲的声音，一定会是极大的精神上的支撑和指引。大多数人或者不能思考或者沉默屈服。但张大中的母亲是不一样的。她超越常人，是一位英雄。

王佩英得到“平反”后，法院付给她的家人三千元钱，她的工作单位又付了四千元，合在一起，给了她的七个孩子每人一千元。（当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不到一百元。）然而，文革后的当局从来不肯明确承认那是对错判死刑的赔偿。张大中用他得到的一千元钱开了一个电器小作坊，一步步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家。

在电话上，张大中先生说到，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位手脚被捆绑的青年英雄受难的青铜像，顿时禁不住泪流满面，因为这让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但是他不知道这名英雄是谁。

我在芝加哥街头找到了这座铜像。这是Nathan Hale，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1岁。在青铜像的底座上铸有他的名言：我遗憾我只有一个生命可以奉献。

人们给英雄铸造青铜像，希望英雄的名字和精神会流传人间如青铜般长久。希望有一天能为王佩英也铸造一座青铜像。但是，在此以前，也还能做和铸造青铜像一样富有意义的其他事情，这就是阐明真相和坚持正义。张大中先生自任导演为他的母亲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片名为《我的母亲王佩英》。此外，一个不那么广泛而直接诉诸于人们的视听的工作成果，是他在得到母亲的第一次平反判决书后继续上诉，在2011年为王佩英取得了第二次平反判决书。

这份第二次平反判决书引用了1970年的死刑判决和1980年的第一次平反，然后从诉讼法方面对这次审判作了说明。第二次判决书的结论是八个字：被告人王佩英无罪。

简短，明确。只是宣告“无罪”：对一名批评毛泽东的政策和文革的人，对一名当众呼喊“打倒毛泽东”的人，宣告无罪。至于王佩英是否有精神病？王佩英是否确实呼喊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王佩英所写的关于1960年前后的经济政策以及关于文革的传单的内容是否正确？这些法院都不予置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都与“有罪”还是“无罪”不相干。不相干的事情就不必予以论述和判决。

如果一个人被控告杀了人或者伤了人，而被告可以证实有精神病，那么被告可以被判决不负刑事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是否有精神病的辩论才是必要的。如果被告的“罪状”是别人都穿黑的蓝的衣服的时候，他/她却穿了一件色泽鲜艳明亮的衣服，法庭当然不需要过问是否精神病人，就应该判决无罪。

如果一个人被控告偷了东西，那么法庭需要看是否有证据。如果一个人被控告的只是在公园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并唱了歌，法庭当然不必过问被告是否去了公园和唱了几首歌，就应该判决无罪。

王佩英的第二次平反判决书的重要性在于，法庭认为王佩英的“反动传单”或者“反动口号”与“有罪”“无罪”不相关，不需要像她的第一次平反判决书那样用特殊原因即精神病来为她辩护开脱，也不需要进行事实核对。实际上，这不但是一个案件的结论的改变，而且也是定罪标准的修改。从司法的角度看，这是重大的区别。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重要的改变。从现实的角度看，司法判决书的力量不但在于有执法力量将其转换成实际行动，而且司法判决也不仅针对个别案子而且关系到所有同类的案例，因为在理论上说，法律应该对一切人平等适用。希望如此。如果王佩英的第二次平反判决书会对其他案例发生影响，那么，这是参与这一判决书形成的人们的贡献，也是王佩英的牺牲带给当下的中国人的宝贵礼物。我们都应该感激她。

~~~~~

## 【往事非烟】

### 试论文革中人性的恶与善——以北京大学为例

• 舒 声 •

所谓人性，即人类的共同属性，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

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人性大致有性善和性恶之说。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188页）孔子认为：人的先天本性应是相近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教育的差异，从而导致人的性情的改变。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在论述人之本性时有“四端”之说。即人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孟子之“四端”说，是儒家性善论的代表。这个思想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曰：“由此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

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又进一步分析“四心”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里孟子把人的“四心”定义为“四端”，端即首也，开端即开始。（《四书·孟子》170页）在孟子看来，“善”是人的一种价值取向，人性天生是平等的，都有趋善的本能，只要经过合理引导，就能使人性得到不断地提升。正是孟子认为人性是“趋善”的，为人在天地间树立起了一个高大而鲜明的形象，高扬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使人的尊严得以在社会中得以确立，同时使人们自觉地有了一种价值认知，这样，生命的尊严才可能制衡政治威权带来的损害〔1〕。

但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性善良美好的价值观全部被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学生斗老师、校长，群众斗干部，干部之间、群众之间互相斗，甚至在一个家庭里的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并且由开始的文斗，转化为武斗，造成无以数计的死伤者和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即“仁义礼智”在文革中全都被一扫而光，不见踪影。

例如发生在1966—1968年的北京大兴大规模杀人事件、湖南道县杀人事件、广西食人事件以及重庆、广西、贵州、陕西、温州等地大规模武斗死伤事件都是人性恶化的极端案例，令人惨不忍闻，本文不再赘述。

## 一、文革中人性之恶的表现

笔者文革中所在的北京大学，是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也是文革中的重灾区。这里仅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述几件文革中人性恶的事实：

### 1、六一八事件

1966年6月18日，由于不满工作组对以陆平为首的前党委“黑帮分子”的“温和包庇”，部分学生中的“勇敢分子”，把40多名干部、教师抓到38楼前门前的高台上，戴上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进行批斗。这些高帽子有的就是从厕所找出的铁丝筐做成的，把被批斗者头按低，高呼口号，强迫他们认罪。笔者亲眼看到技术物理系副主任刘元方（文革后成为科学院院士）被几个学生扣上高帽，在楼外游斗。工作组得知后，派人进行了制止，并写了简报上报中央，这就是所谓的“六一八事件”，从此开创了北大暴力批斗干部、教师的先例。

### 2、北大附中学生皮带抽打工作组

1966年8月4日晚，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全校师生大会，康生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被冲上台的北大附中学生用皮带抽打，并被批斗，坐喷气式。而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非但不制止，反而和附中学生彭小蒙亲密拥抱。

### 3、聂元梓支持打手打人

1967年3月份，北大校文革开展整风，一些教师、学生真诚地给聂元梓提出了些意见，岂料聂元梓不但不接受，反而对提出意见的人打击报复。一天晚上在大饭厅召开的大会上，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几个头头在台上，台下有一个学生大声发言，提出不同意见，聂元梓边上的一个穿着黄军装、肥肉大耳的保镖冲下去就打这个学生，在下台前他撸起袖子，把自

己的手表摘下来交给聂元梓，聂元梓不但不制止，而且替他拿着手表，直到他教训完那个学生回到台上，聂元梓才把手表还给他。我当时离得主席台很近，亲眼目睹了全过程。我问身边同学这个打手是谁？有知情者告诉我他叫黄元庄，是个食堂工人。在此之前我对聂元梓还有几分敬意，此后对聂元梓极其反感，认为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怎能这样缺乏人性？就是这个打手黄元庄，以后被提拔为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武斗副总指挥，积极参与武斗。工宣队进校后，查出黄元庄有经济问题和流氓行为，黄被开除党籍，定为坏分子。

#### 4、私设监狱，樊立勤被非刑拷打致残

生物系1963级学生樊立勤，文革中曾反对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发言，成为知名人物。1967年，他组织了《东方红公社》，批评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并给康生贴过大字报。1968年3月，樊立勤被聂元梓手下的新北大公社成员抓进43楼私设的监狱中，酷刑拷打，刑讯逼供。由于樊立勤坚强不屈，被打手们用钳子夹碎手指，铁钉钉入膝盖，造成腿部残疾，奄奄一息，几天后被扔出楼外，井冈山兵团的群众发现后送往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但成为终身残疾。我不理解，这些打手们为什么这样凶残，能够对同学使用在白公馆、渣滓洞里才能使用的酷刑？他们怎么能下得去手？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失去了人性？

#### 5、光天化日之下刺死无辜学生殷文杰

1968年4月27日，无线电系1962级学生殷文杰从宿舍走到44楼附近，有人突然叫道“他是过大江的”（过大江是该系井冈山派的一个战斗队名称），于是过来几个手持长矛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举起长矛刺向他。他逃跑不及，被刺倒地，虽然有人阻止，但武斗队员仍狂刺不已。殷文杰后来被卡车送到离北大很远的七机部某医院，心脏已停止跳动，据医生检查，身上有39处伤口。在家属未来之前，殷的遗体被草草火化。后来查明，刺死殷文杰的主要凶手是东语系学生杨恭谦和数力系学生郭玉堂，但他们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被正常分配。1973年5月19日，北大曾致函杨恭谦所在单位，要求对他按照政策处理，但不知处理结果如何。郭玉堂被分配到山西离石中学任数学教师，据说教学质量很高，被评为特级教师，2006年退休后患癌症去世。不知道杨、郭二人离开北大后是否做过恶梦，梦到被自己刺死的同学殷文杰死去的惨状？良心是否受到过谴责？

#### 6、设立劳改大院，残酷迫害干部教师

北大校文革成立后，曾先后在北大校内和位于昌平太平庄的分校设立劳改大院，也称“黑帮大院”和“牛棚”，关押过几百名干部、教师，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和批判斗争。关于劳改大院的具体情况，季羨林的《牛棚杂忆》和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这里再引述一下原西语系女教师郑培蒂所著《云卷云舒》中的记录：

“牛棚”一词源于关在里面的“犯人”是“牛鬼蛇神”。北大的“牛鬼蛇神”包括校系领导人，德高望重的教授，尤其是留学回来的老教授，“历史反革命”以及“现行反革命分子”等。我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红卫兵等我把儿子一生下来，就跑到家里来抓人，将正在吃奶的儿子一把扔开，当着我婆母的面推着我踉踉跄跄地下楼，一卡车的“小将”把我押回北大。

我们都睡在地上，只铺了点稻草，夜晚砖地的凉气直袭脊背。成群的蚊子在耳边飞舞，好像也仗势欺人，我被咬得体无完肤。记得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地上望着破窗外的夜空，流着泪，思念着刚出生的儿子，思念着远在西藏戍守边疆的丈夫，不知何时才能熬出头。

第二天我们被驱赶到院子里排队、训话。监改人员先把我们臭骂一通，然后打开“红宝书”，要求我们当他们背诵哪几页哪几段“毛主席语录”，晚上收工时检查，接着分配当天的劳改任务……。

监改人员兴之所至就折磨人寻开心。一日天气炎热，他们坐在院子里一棵大树下乘凉，叫我和朱光潜先生接了水一盆一盆泼洒在地上为他们解暑。给我们派这“轻活”，因为我刚生完孩子，体质很差；朱先生是西语系教授，美学界的权威，白发苍苍，瘦弱不堪。红卫兵们甩着打人的皮带问他“老家伙，想怎么死？上吊有绳子，抹脖子有刀子，你要哪样？”我十分害怕，只见朱先生照旧泼水，好像没听见，使我既感且佩。

又有一次，是中午，不知邓懿（西语系教授，周一良夫人）怎么得罪了监改人员，他们不准她吃饭，叫她到院子当中罚站，并且强迫她仰着头直望太阳，不准低头，不准眨眼。邓懿本来高大，因为瘦了，衣服仿佛“挂”在身上，脚下是一双黑布鞋。那天她在毒日头下站了很久，并不求饶，那倔犟的模样，叫我至今难忘。

监改人员会随便揪出一个“罪犯”来，叫他背诵当天指定的毛主席语录段落，稍有磕巴，就是一顿毒打。教过我的徐锡良老师是美国华侨，因为爱国，全家投奔祖国。他的英语口语非常好，跟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他讲中文有困难。他总背不下来，便遭毒打，还叫他头顶一碗水在搓板上跪着……徐先生从劳改大院放回家后不久就溘然长逝了。

我认识的教公共俄语的王家福，是个严格的老师，常常被一个生物系的学生“提审”，王老师被打得脸肿不能说话，浑身青紫。夜晚，从“刑讯室”常常传来监改人员的怒吼声，清脆的耳光声和皮鞭、棍棒的声音，还有受刑者悲惨的叫声〔2〕。

我不理解，那些负责监改干部、教师的学生，怎么能够对教育过自己的老师又打又骂？你们的人性到哪里去了？在文革过去50年后，你们也垂垂老矣，是否有过忏悔之心，是否向曾被你们打骂过的老师道过歉？

## 二、文革中人性善的亮点

在文革中虽然很多地方充满了人性恶的现象，但很多人并没有丧失基本的人性，在很多场合也有人性善良一面的体现。在北大文革中，这样的亮点也有很多。

### 1、阎文儒侍师如亲

1966年9月27日，历史系“系文革”通知部分教师，前往位于昌平太平庄村（文革前历史系半工半读试点所在地），接受劳动改造。其中有老教师向达、杨人梗、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宿白、杨济安、阎文儒等，年轻教师有徐天新、吴代封、范达仁、夏应元、郝斌等。向达当时已经66岁，头上顶着两顶帽子：“反动学术权威”和“大右派”，监管学生高海林，对教师态度十分恶劣，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向达不过说了一句：“我到了这里，没有什么牵挂，能跟大家一块安心学习”，高海林就跳了起来，喝令向达站立、低头、弯腰、大骂他“抵制监管、反攻倒算！”当时54岁的阎文儒老师，到了晚上，就拿起向达的脸盆，从住处走过河滩，再爬过一个小山坡，到伙房，顶着北风，给向达打回热水，待他洗完脚后，又一声不响地端起脸盆，走出房间把水泼到老远的河滩。后来，阎文儒不只打水、倒水，还给向先生脱鞋、脱袜子、穿鞋、穿袜子。同室的郝斌等人看到，向达的双脚已经肿起来了，邓广铭先生悄悄地告诉他：“这不好，男怕穿靴，女怕戴



冠，他怕是穿靴了！”这时向先生已经患了尿毒症，过了几天被允许回到城里治病，为时已晚，于11月24日离世（3）。

向达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南联大教授，1939年，阎文儒考取了设在西南联大的北大文科研究所，跟随向先生学习，1942—1944年经向先生推荐，参加了中央研究院西北考察团，参与了民勤、武威、张掖的古墓挖掘。20多年过去了，阎文儒已经从当初的青年学生变为年过半百的老教师，还像当年一样尊敬、照顾自己的老师，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怎能不让人感动，也足以让那些打骂、残害自己老师的“红卫兵”们羞愧！

## 2、海淀邮局救人

1966年8月，北京市出现了一股中学红卫兵“破四旧”、乱打人、乱抄家的“红色风暴”，一些中学的校长、老师被打死打伤，社会上也有的人被抓去殴打。笔者的小学同学——清华附中的青年教师陈书祥的父亲（科学院仪器厂工人），就被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抓去殴打致死。

一天傍晚一个海淀邮局的职工（男，大约30多岁），来到北大41楼学生宿舍，找到技术物理系放化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向他们反映：八一学校的部分红卫兵抓人、打人、私设牢房，做法十分残忍，该班学生答应第二天去调查。他走后一个多小时，又打电话来说：八一学校学生到海淀邮局去抓他，希望得到保护。该班同学经分析后认为此人不像坏人，应予保护。于是七八个同学赶到位于黄庄的海淀邮局，进门一看，十几个中学生有男有女，全都是一身军装，胳膊上套着红袖章，手拿木棍、铁链、铜头皮带，气势汹汹地要邮局交人。北大学生先亮明身份，然后问怎么回事？一个个头很高的男中学生气呼呼地说，他们是来抓流氓的，就是某某某（那个邮局男职工）。北大学生问：你们怎么知道他是流氓？那个男生说：他们单位有人揭发的。在场的几位邮局职工说：这是污蔑，此人一贯表现很好，是有人背后陷害。并告诉北大学生说：是他们的单位的一个头头，因为此人平时爱提意见，故意给他穿小鞋。北大学生说：“有人说他是流氓，但是要有证据，没有证据不能下结论，难道我说你们是流氓，你们就是流氓了吗？”中学红卫兵见说不过，就要动手，这时北大学生的援军到了，又来了七八个身强力壮的男生，在气势上压倒了中学生，并和颜悦色地劝告小弟弟们：“毛主席说我们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重视调查研究，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但还要有科学态度，不能盲目乱干，否则容易被坏人利用”。这帮中学生见大哥哥们说的有理，只好悻悻地收兵走了。事后，那个邮局职工才从躲着的后院走出来，一个劲儿地感谢。北大学生怕中学红卫兵还会来抓他，把他带回学校宿舍住了几天，看没有危险了，才让他回单位了（4）。

## 3、巧化“大不敬罪”

1966年8月18日起的两个多月里，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一起，在北京八次检阅1100万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北大技术物理系放化专业三年级的学生们也都参加了活动。在回校学习分组讨论时，不少同学回忆当时场景，激动万分，这个说“我看见伟大领袖高大魁梧，红光满面”，那个说“我看见伟大领袖向我们招手了”，还有两位激动的热泪盈眶。这时，一位姓郑的同学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至于吗？领袖不是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和我们一样吗？”此话一出，大家顿时愣住了，宿舍里的空气像冻结了一样，郑同学也自觉不好，赶紧说了一句“真热爱领袖的话，就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可是为时已晚。很快就有人把此事报告给系文革，在楼道里贴出了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纲上线，要批判郑某某“攻击伟大领袖的罪行”，“把反革命小丑郑某某揪出来示众！”郑同学出身贫苦家庭，为

人忠厚，爱说实话，班上大多数同学并不认为他是反革命，只是认为他“出言无忌”，顶多是“对伟大领袖感情不深”，当系文革派人来调查时，很多人替他辩护，从他的家庭出身，平时表现等等说明他不可能是“反革命”，和他一个小组的杨同学机智地说：“老郑的话我也听到了，他的原话是说领袖的伟大不在于外表，外表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而且他后边还有一句话：‘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讨论得很热烈，有些同学没有听清，我可是听得很清楚的”，这四两拨千斤的话，巧妙地化解了郑同学的“大不敬罪”。文革中，因为说错了话，喊错了口号，写错了标语，不小心弄污了领袖的照片、画像，被批斗，示众，判刑甚至处死的，所在多有。在同班同学的保护下，郑同学只是在小组会上作了几次检讨，“斗私批修”，就算过去了，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5〕。

#### 4、保护被康生点名定罪的学生

1966年12月份，北大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63级学生崔某、张某、席某三人，从外地串联回来，看到各地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批斗干部和“学术权威”的现象，对江青、陈伯达的几次讲话感到不满，并对抓李洪山等学生表示不解，于是给时任中央文革顾问的党内“理论权威”康生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的困惑。谁料这个理论权威抓住这封信大作文章，亲笔批示，给崔某等三人扣上“反对对彭、罗、陆、杨进行斗争，歪曲两条路线斗争，抗议对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同志，打击革命左派，包庇反革命分子，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等7条罪状。聂元梓和校文革接到康生批示后，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对三人进行批判，大喇叭声嘶力竭，大字报铺天盖地。他们只能每天呆在宿舍里，连门都不敢出。去饭厅打点饭还得低着头，生怕被人认出来拉去批斗。日复一日地闭门思过，反反复复地写检查，崔同学的精神几近崩溃，当时感到极度绝望，几次想轻生，但又考虑到自己死了不要紧，如果把自己定为畏罪自杀，必定要株连年迈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弟妹。所以最后还是咬着牙挺了过来。由于长期处在极度惊恐、煎熬之中，身心受到很大摧残，最后，终于撑不住了，崔同学大病了一场，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他们所在的班是一个十分友爱、团结、温暖的集体，班干部敢于主持正义，坚持原则，并富有同情心。鉴于当时北大因被批判自杀的人很多，班干部担心他们经受不了这种“康式”打击，因此向校文革提出了慎重处理的意见，使他们躲过了即刻被揪出来进行批斗的劫难。不仅如此，班上同学还阻挡了一拨又一拨激进学生要抓三人去批斗的行为，坚定地说：“崔某等三人是我们班的，我们会按政策处理他们”，那些人只能悻悻而归。在他们落难的时刻，难能可贵的是还有不少同学私下里表示同情，给他们以鼓励和帮助。系里老师也没有另眼看待他们，有的还对他们的境遇表示同情。技术物理系系副主任、著名核物理学家虞福春老先生就曾说：“康生对青年学生如此批判太过分了！”在班上同学的保护之下，他们三人幸免于难，被正常分配，1978年得到平反，从档案中撤出不实材料。后来他们分别进入大学和科研单位，为科教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试想如果不是同班同学顶住压力、奋力保护，这三个被康生亲自点名的学生的下场会如何？〔6〕。

#### 5、通风报信，保护周培源

1967年，著名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先生出于义愤，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半年后经周恩来总理劝告，退出了群众组织。聂元梓等人对周培源恨之入骨，组织人员内查外调，罗织了一些材料，主要问题有两个：其一，1945年1月，周培源曾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在美国海军部军工实验站研制鱼雷，于是被聂孙校文革打成“美国特务”。其二，周培源和夫人喜欢收藏书画，收藏和转让的过程被说成“倒卖书画”。经过密谋策划，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组织了新北大公社部分工人和学生，准备查抄周培源家，并绑架周本人。

无线电系1965级学生刘澍民，是新北大公社成员，尽管他在政治上认同聂元梓和校文革，但他对周培源怀有深深的敬意。听说要抄周家的消息，他感到十分震惊，抄家、绑架，不仅会有财物和精神上的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周先生的人身安全，此类事情在文革中十分常见；但如果泄露了消息，则是背叛“无产阶级左派”聂元梓，背叛“红色政权”。刘澍民处在两难境地，思想陷入了激烈的斗争。终于，良心占了上风，他下定决心，趁着夜色，前往位于燕南园56号的周家。当他进入周家时，由于紧张、激动，竟然啜嚅着说不出话来，经周夫人好言好语地抚慰，他把消息告诉了周先生一家。得知情况后，周的小女儿赶紧跑到28楼，找到井冈山总部勤务组长侯汉请，侯连忙召集总部几个负责人商量对策，决定把周培源接到28楼，派人专门照顾，确保人身安全〔7〕。化学系1963级学生朱开定负责照顾周先生的生活，和他共同生活了50多天。

1967年12月21日夜，新北大公社派人冲进周培源家，把周家的物品砸得稀烂，打伤了周的夫人和女儿，还广播了《打倒大特务周培源的声明》。但周培源本人在井冈山兵团的保护下安然无恙，一直到北大武斗前1968年3月25日，被护送到傅作义别墅（海淀镇西南某村庄）暂居，329事件发生，周先生被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接手保护〔8〕。

刘澍民同学的义举保护了周培源先生，使其免受伤害，不仅受到了周培源一家的感谢，也赢得了北大广大师生的赞佩。

### 三、总结历史经验，呼唤美好人性的回归

巴金先生曾说：“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探索：人怎样会变为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作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号召，进行鼓励，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会使我丧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余悸’，我唠唠叨叨，无非是想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关进牛棚。应当把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9〕

文革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些人性恶的现象？是什么使一些年轻的大、中学生变成残害老师、同学的打手和杀害同学的凶手？笔者认为，这些青少年大多数并非天生的恶人，他们原本也有善良的一面，只是在文革这样特定的条件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扭曲了他们的人性，把老师和同学当成了阶级敌人，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当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斗争的继续”，自以为是在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伟大领袖，才对自己的老师、同学和无辜群众下毒手的；当然，也不排除少数思想品德恶劣，在运动中想出风头，表现自己的所谓“勇敢分子”。这种“勇敢分子”实际上是流氓无产者，在历次政治运动（如湖南农民运动、土改）中都有这样的人出现，他们往往得到某些领导人的青睐。要想避免文革中这种人性之恶的现象重演，应从源头上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和“斗争哲学”，继承中国古代“和为贵”的思想和传统的道德规范，建设文明和谐的法制社会，使自由、平等、文明、和谐、团结、友善、公正、法治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在文革开始50年和结束40年之际，我们应批判、摒弃丑恶的人性，呼唤美好人性的回归，不能允许文革中广大干部、教师、文学艺术家、体育工作者、青年学生等广大群众受到迫害的悲剧再次重演，必须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反思文革，汲取文革的教训，铲除发生文革的土壤，还应该解除禁区，开放文革档案资料，允许和鼓励研究文革历史，给子孙后代留下应有的历史遗产，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中华民族真正走向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 1、叶匡政，孟子论人性，今晚网，2016年9月22日。
- 2、郑培蒂，《云卷云舒》，121—128，东方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
- 3、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73—79，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版。
- 4、顾仁虎，海淀邮局救人记，载于《怀燕集》，13—15，2005年9月。
- 5、顾仁虎，巧化大不敬罪，载于《怀燕集》，15—16，2005年9月。
- 6、崔子明，康生批我七宗罪，刊于《昨天》80期，33—38。
- 7、奚学瑶，十年风焰满燕园——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载于丛璋等主编《燕园风云录》第一集，293—295。
- 8、朱开定，与周培源过从二三事，载于丛璋等主编《燕园风云录》第四集132—133。
- 9、巴金，《十年一梦》，第19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四）

• 王复兴 •

（上接zk1612d）

## 第五章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

### 1、打倒刘邓大游行

1966年11月8日，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在校园内贴出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新北大公社”后来参与创办《动态报》的负责人胡宗式曾问过聂元梓：“为什么不贴一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大字报？而贴二号走资派的大字报？”聂元梓回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态度较好，邓小平的态度不好。我们写大字报轰他一下。”

1966年12月26日，清华等高校率先到北京市内及天安门广场大游行，主要口号是“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万岁！”等。

1967年《红旗》元旦社论，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我认真看了这篇社论，一直琢磨，“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新的一年，会斗的更厉害吗？

1967年元月2日，北大等高校继清华之后，于新年之初，也到市内及天安门广场大游行，高呼口号“打倒走资派刘少奇！”等。以上两次大游行是北京市群众首次在公开游行示威中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元月2日北大的大游行，我也参加了。

## 2、一次辩论大会

1月6日，在北大的大饭厅有一个辩论大会。辩论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什么路线。我们“红梅”7人坐在大饭厅比较靠前的中部位置。生物系学生樊立勤登台演讲，批判聂元梓、校文革执行了资反路线。扬子浪、索世晖先后登台与樊辩论。最后有个“红旗兵团”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与樊辩论，他指出樊运用的是诡辩术，是彭真《二月提纲》里那一套“错误言论人人有份”，要通过批判聂元梓来扭转斗争大方向，干扰批判刘邓资反路线。他批的樊立勤竟无言以对。马西沙在台下高喊：“樊立勤，你滚下来吧！”我们马上呼应，很多人也即时响应，樊立勤只好离开了。

过了13天，樊立勤贴出一张大字报《康生是什么人？》，批判康生搞“封、资、修”，揭发康生参观潘天寿（著名画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浙江美院院长）画展，并题字“画坛师首、艺苑班头”。文革时潘天寿被打成“反动权威”、“反动画家”。樊是如此揭批康生的。陈一谔在其《回忆录》中对同一派的樊立勤的此份大字报的评论是：“他贴康生的大字报，是认为康生左的还不够。”陈一谔说“我对他许多过于极端的痞子想法和厚黑作法并不苟同。”（注1）樊立勤炮打康生的目的，是因当时北京高校、中央党校有股反康生的风潮，他是想赌一把，如果康生倒了，正如他曾对同伴讲的“康生是聂元梓后台”，（樊的根据是聂元梓曾按照康生指示把经济系教师杨勋押送去公安部，当时周恩来也做了相同指示），这样聂元梓就得垮台，证明他樊立勤一贯正确，是英雄，而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也会跟着聂垮台、解散。正如樊立勤在后来5月17日成立“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时的《宣言》所言，他与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师生的矛盾是路线斗争，声称“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观察、对待校文革和“公社”。《宣言》并说新北大公社门“是大杂烩”、是校文革的“御用工具”。矛头指向了几千名师生。《宣言》说“校文革在校内外顽固地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要与聂元梓的资反路线斗争到底。所谓资反路线即严重的右倾路线。聂元梓反陆平、反工作组、到上海串联反上海市委、一月风暴参加夺权，这明明都是左，樊立勤把聂的左当成右来批，他岂不是更左？1967年的北大，左倾狂潮一浪高过一浪。这就是当时的大环境。聂元梓在文革中的最大错误，是从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犯了左倾的政治思想之错而不是右倾。

## 3、军训

1月8日，解放军军训团进驻北大。军训团由63军和军委装甲兵组成。此前的1966年12月，中央便发出公告，要各地大、中学校学生停止串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北大90%学生返校。历史系当时也来了几个解放军。我们当时议论“不让到外地串联了，要复课了，毛主席这是要收尾，结束文革了吧？”可是实际上，军训团进校后，既没正规军训，也没复课。只是操练了几天集合、队形、排队走步等，解放军不介入北大运动，运动照常进行，文革没有一点结束的意思。

#### 4、1月夺权风暴

1月1日，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据查，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调查员”身份到上海策划夺市委的权。）

1月6日，上海全市造反派召开大会，批斗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大会宣布不承认上海市委领导，并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1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成立“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

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宣告夺了上海市委走资派的权力。《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从1月9日开始，由上海发端的自下而上的夺权风暴，迅速波及全国，此即1月夺权风暴。

1月10日，北大“红旗兵团”写作组“横扫千军”开会，扬子浪提出应学习上海造反派，去《北京日报》夺权，我马上赞同，于是决定“红梅”与扬子浪一起去《北京日报》。

1月11日，到了“北京日报社”，我们首先和报社的造反派“星火”战斗队取得联系。扬子浪为“新北大红旗兵团”起草了《致北京日报革命造反派的公开信》，抄成大字报贴出。本想争取此文见报，但没做到。“北师大井冈山”最先到达报社，我去找他们头头联络，商量如何联合行动。感觉很别扭，他们不大愿意与北大商量事，有排斥他人的倾向。过了一、二天，“北航红旗”也来了，他们很快与北师大的人产生矛盾。我们与“北航红旗”较一致。

在报社呆了六、七天，下一步干什么？怎样夺权？什么程序？什么原则？茫然无头绪，于是我们就撤回了北大。回北大后，李醒尘分别找了我与扬子浪，动员“红梅”、“横扫千军”去上海。李醒尘当时负责校文革驻上海联络站。李醒尘还曾带着我去聂元梓家，商量如何开展上海联络站的工作。我们大家决定去上海闯闯，投身到一月风暴的中心去。

1月中旬，我和扬子浪、马西沙、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黄虹坚、陈双基九人，应上海工交系统一个造反组织的邀请赴沪。我们九个人憋在运货的火车车厢“闷罐子”里，咣当、咣当了一夜加半个白天，第二天中午抵达了大上海。到上海后和北大驻沪联络站李醒尘老师取得了联系，接受他的领导。我负责与工总司的联络，黄虹坚去参加《文汇报》的运动，其他人介入了上海工交系统的运动。我们在上海做了以下几件具体事：为一批农民工（临时工）维权，向有关单位争取他们的补贴；把几个搞打、砸、抢的上海中学生扭送公安局；动员在上海串联的北大学生回北大，参加军训，复课闹革命。

2月5日，我们在上海人民广场，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宣布：张春桥为公社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为副主任。过了几天，李醒尘在北大驻沪联络站召开会议，传达张春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张说，毛主席考虑，如果各省市夺取后都像上海一样成立“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了，国号、国体就得改变了，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会受很大影响，各国要重新承认你，苏联是不会承认

的。这是个大问题。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2月24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 5、造反派在夺权中分裂

2月8日左右，我听说北大已开始军训，而上海的一月夺权已完成，觉得呆下去没多大意思。于是和大家商量，决定我一个人先回北大了解情况，再决定大家的去向。

2月中上旬我一回到北大，就了解到在北京一月夺权过程中，北京市在造反派内部，发生了尖锐矛盾，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在《红旗》杂志林杰支持下，小圈子抱团抢权，排斥、反对新北大和其他高校。

第一件事是高教部夺权。1月18日，周恩来、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接见首都工矿企业造反派代表，高校红卫兵代表列席会议。周恩来讲“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北京市的一些综合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夺权当中要下大力量”（引自北大《动态报》）1月19日）。李清昆告诉我，1月18日周总理布置新北大去夺权的会议，他参加了，确有其事。而后北大校文革成立了“校文革夺权指挥部”。随后，聂元梓在周总理指示下，带领“红旗兵团”等北大学生组织去教育部夺权。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总理当时有个指示，“夺权要在本系统夺”，还说“别的学校都到高教部去了，你们北大的学生也应该去啊。”（注2）北大学生到高教部夺权时，遇到谭厚兰带领的北师大“井冈山”等高校造反派。北大与北师大对支持高教部那一派夺权发生了分歧。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红卫兵联队”吴传启和《红旗》杂志林杰的支持下，支持教育部“北京延安公社”的卢正义夺权。新北大反对卢正义夺权，因为新北大经调查发现卢正义在历史上曾经叛变自首，并出卖过同志。当时新北大等高校到达高教部后首先夺了权。而后，谭厚兰、卢正义带领几百人反夺权，打了北大学生，发生了冲突。这时关锋、王力打电话给聂元梓、孙蓬一，严厉批评了新北大，明显地拉偏架，选边站。于是聂元梓带领北大学生撤出了教育部的夺权活动。清华“井冈山”到高教部的代表胡宗华请示了蒯大富后，发表了“中立宣言”，也撤出了教育部夺权。

在高教部夺权事件中，新北大的部分人发现：《红旗》的林杰、学部的吴传启、北师大的谭厚兰、高教部的卢正义这一圈人勾的很紧，上面有王力、关锋支持，排他性很强，很不正派。在尔后的北京造反派内部的一次又一次冲突中，上面所说的那个小圈子抢权的现象一再出现，从而引起人们深思。高教部的夺权风波，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北京天派、地派两派分裂的开端。开始时只是新北大与学部、北师大“井冈山”的冲突。

关于周恩来当时是否曾指示聂元梓、新北大去高教部夺权一事。有人质疑。当年聂元梓是指示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李士昆二人带队去的高教部。2016年4月29日，李士昆在北京向笔者回忆、讲述了当年的情况。他说：“1967年1月，聂元梓找我和赵建文，传达周总理指示：现在文革发展到夺权阶段，北大、清华要起带头作用，按系统夺权，去高教部夺权。聂元梓要我和赵建文带队去高教部。”李士昆是此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的记忆当然很重要。（新北大师生去高教部夺权，不能因为有周恩来的指示，其性质就变成是正确的。其性质仍然是响应、执行了毛泽东进行夺权斗争的极左错误。从此事件可以看出，无论周恩来在文革中内心是怎么想的，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在政治路线方面，他始终是选择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第二件事是1月15日中央统战部机密档案室被抢事件。学部民族研究所的洪涛和统战部的刘郢把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抢劫一空。民族学院郑仲兵为首的“抗大公社”及统战部的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周总理听取此事的汇报后，指出此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指示要“追回档案”。令人意外的是，公安部第二天把洪涛、刘郢放了，谢富治以“公安部负责人”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讲话，说“革命左派接管档案”是“革命行动”。此“1·15”事件后，统战部和民族委员会系统分成二派，一派是民委洪涛的“红色联络站”和民院的“东方红”，他们得到学部吴传启的支持。另一派主要是民院“抗大公社”的郑仲兵。郑仲兵到北大找聂元梓串联，交流对北京形势的看法，得到聂元梓坚决支持。此后民院“抗大公社”与“新北大公社”成为坚定战友，他们对谢富治都存在不满。

第三件事是1月份两派在中宣部的争执。在陶铸被打倒后，北京市各高校及中直机关各造反组织在中宣部联合批陶，组织了“批陶联络站”。在讨论教育部卢正义所属的“延安公社”能否加入时，发生了分歧，林杰、吴传启、谭厚兰支持卢正义、“延安公社”加入，新北大坚决反对。林杰与新北大“红旗兵团”的代表聂向前（西语系学生）拍桌子大吵。聂向前对林杰说“凭你林杰的权威也不能把卢正义拉进来！”以前屡次显现的那个面貌极左的联盟，再次出来表演，特别之处是第一线后台林杰此次站到了前台。他们那个小圈子联盟，结党营私，到处伸手夺权，排斥异己，并且开始了对持不同意见的聂元梓、新北大、民院“抗大公社”、郑仲兵等，极力进行打击。

当时从许多“耳语”得知，谭厚兰从北师大毕业后分配到《红旗》工作，与林杰同事，后来谭又回到北师大工作。关锋与林杰也曾是《红旗》同事。关锋与吴传启曾同时在学部哲学所工作过。谭厚兰的后台应是林杰。我当时已怀疑林杰的后台是关锋，但不敢说。认为他们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一股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力量。聂元梓、孙蓬一则看的更深入，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已认定王力、关锋是文化大革命的隐患，搞的是一条极左路线。

聂元梓组织了一个直接隶属于她的“除隐患战斗队”，队长是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任务是在极左派里挖叛徒、反革命，整理材料，向中央汇报，此即“除隐患”。“除隐患”战斗队在1967年上半年曾先后调查、整理过45份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和周总理，绝大部分材料是关于卢正义、潘梓年、吴传启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人。2015年4月29日我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向赵建文询问了“除隐患”战斗队文革时期反王、关、戚的情况。他说，开始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没有王、关、戚。67年1月在高教部夺权时发现了卢正义的问题，他是叛徒，写过自首书，而且确实出卖过同志。但奇怪的是，吴传启、林杰、关锋、王力不遗余力地支持卢正义夺权。因此开始调查吴传启一伙人的问题。67年春天筹建北京市革委会，戚本禹把许多学部吴传启那一派的人塞进市革委会里，如周景芳（后成为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林杰的妻子王乃英、关锋的妻子周英等。吴传启担任了《北京日报》顾问。他们那伙人一方面指使地派要打倒几个副总理，另一方面拚命抓权，想要控制北京市革委会。于是“除隐患”抓紧了对吴传启等人的调查。当时，学部吴传启的对立面把吴传启“学部红卫兵联队”的一个头头王恩宇给抓起来了。“除隐患”的赵建文等人联系了学部吴传启的对立面之后，去学部提审了王恩宇。王恩宇交待了大量戚本禹的材料，同时表示戚本禹上面有人支持，暗示是康生。此次调查使赵建文、聂元梓确定了戚本禹与王力、关锋是一伙的，但由于涉及到康生，风险太大，就不敢往下查了。不久，聂元梓让“除隐患”战斗队解散。（见聂元梓《回忆录》242页第十二章第八节）

有鉴于北京在一月夺权中发生的三件事，我想在上海的战友们应赶紧回北大。于是在2月下旬使用校文革带扩音器的电话热线与驻上海联络站通电话。当时校文革常委侯汉青给我接通了开放式电话，并站在我旁边，我对在上海的“红梅”的六人和扬子浪、黄虹坚说，



“赶紧回北大，有新情况。”问我“什么新情况？”我说“有人反对新北大，林杰有问题。”回复“好，尽快回北大。”俞政回来后对我说，“你说林杰有问题，吓了我一跳，赶紧回北京吧，看看怎么回事。”

## 6、历史系的一场小风波

我2月中旬回到北大，历史系出去串联的绝大部分同学已返校，开始军训。当时军训团正协助校文革酝酿合并校内的几个红卫兵组织，建立统一的红卫兵组织“新北大公社”。这时在历史系38楼的楼道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不能允许王复兴加入红卫兵组织“新北大公社”，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贴这张大字报的是一年级考古班的肖润云。他是反校文革“主义兵”的，贫下中农出身。我心想，他可能因为站错队，校文革又不搞血统论，怕自己进不了“新北大公社”，因此通过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用“出身好”、“自来红”来争取加入“公社”。

四年级考古班“红旗兵团”“红色清道夫”战斗队的彭浩看不下去，打抱不平，也贴了张大字报反驳肖润云，说王复兴是“红旗兵团”“红梅”战斗队的，在运动中表现优秀，最有资格加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我一回到38楼就听说了此事，看到了彭浩为我打抱不平的大字报，想起肖润云曾在66年8月随张某闯进我的宿舍，勒令我不许出去串联。心想，这是个小谭立夫，是跟在高干子弟屁股后面跑的“小吹辈儿”。凭着出身想压我，没门，得反击一下。这时历史系“红梅”的4人已回北大。我和徐森商量，要反击一下“主义兵”的挑衅，批一下他们一年级的头头张某，徐森赞同。于是在楼道里贴了一张针对张某的大字报。我当时这么做，有一种报复心理。（张文虎当时不同意针对同学贴大字报，几十年后告诉我，他私下去找张某道了歉。）我和肖润云不在一个班，平时无任何来往，也没说过话，从无过节。但他后来又多次向我发难，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估计是受血统论影响，有着以“出身”来为自身争取利益及社会地位的强烈冲动，于是老拿我当“靶子”，以损人来利己。

1968年秋工宣队进校后，有一天在阶梯教室开全系大会，快散会时，肖润云突然站起来说，“大家注意，我揭发一件事，王复兴是从美国回来的。”过了几天，在一年级全体学生开会时，肖润云又指着我说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似乎这是我极大的历史污点。我马上对他高声喝斥“你少和我来谭立夫那套！”他跳起来指责我，但我不再搭理他，说他一句足够了。1970年毕业前，肖因桃色新闻把自己搞的挺没面子。他追求一个同班女生（高干子女、校田径队员），人家女生不愿意，他一天到晚缠着人家，强求相好。他的“出身优势”没起作用。后来二年级男同学几次出面警告他，让他不许骚扰那名女生，他才不得不罢手，在全系闹的挺热闹。

王渊涛几十年后问我，为什么当年对从美国回来的这件事不解释一下（意思是那是一段爱国的家史）。我有什么好解释的，能解释这件事，却解释不了父亲57年的事，虽然父亲在62年已被摘了帽，但那时管父亲这种人叫“摘帽右派”，颜色还是黑的，反正摘不掉“黑五类”家庭的帽子，何必越描越黑呢。管他别人怎么说，走自己的路就是了。

1967年2月15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组织正式成立。“红旗兵团”、“东风兵团”、“北京公社”、“红教工兵团”等几个组织合并，以“红旗兵团”为主体，几个组织的全体成员成为“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的当然成员。我摘掉了“新北大红旗兵团”的袖章，换上了“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的袖章。“公社”总部成员有孙月才、卢平、刘冲、李长啸、夏剑甬。

1967年2月22日，首都红代会成立，全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新北大公社加入。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形式上统一。核心组成员有5人，组长聂元梓，副组长：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8月时，聂元梓派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马云龙做她和“新北大公社”的代表，常驻首都红代会。

## 7、对文革的困惑

1967年2月18日，军训团撤走，“复课闹革命”泡汤，文革结束无望。大约在2月底的一天，徐森和我吃完晚饭后，在校园漫步闲谈，他突然对我说，“现在到处‘兵荒马乱’，国家成什么样子了！现在人们是敢怒不敢言。”听他这么讲，我一惊，赶紧说“你可千万别到处乱说，千万！”心想，他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传出去可不得了，一准打个“现行”（现行反革命），没个跑。同样的话，他对张文虎、俞政、王渊涛也说了。他可能是太憋闷，不吐不快。但他也就敢对几个哥们儿、死党讲讲，知道不会出卖他。当时面对一月风暴后的乱局，我们几人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不理解，但谁也不会讲出来，而是要求自己努力去理解，不理解也得紧跟。

大约也是2月底，听说聂元梓要解散校文革，她本人则要辞掉校文革主任一职。这事还真有。过了二天，聂元梓召开了校文革常委及公社总部、各系战斗团团长联席会议，提出，文革发展到现阶段，她本人及校文革已无水平、无能力领导北大的运动，提议解散校文革，她本人辞职。结果遭到一致强烈反对，否决了她的提议。（看来，聂元梓经过一月夺权后，对文革开始不理解，有了看法。但她欲罢不能，于是开始抵制，这和她后来反王、关、戚是一脉相承的。）

聂元梓本人在《口述自传》中说，“到了夺权阶段”“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怀疑以后，我就产生了退下来的想法。”她关于解散校文革和辞职的提议被否决后，一直没死心。1967年6月5日陈伯达针对北大的讲话，引起北大分裂，再次大乱之后，聂元梓于7月，在校文革常委会范围内，提出要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报告要解散校文革、并辞去主任职。但遭到常委们反对而作罢。8月，全国形势大乱，各地发生反军浪潮，运动严重失控。聂元梓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接见会上，周恩来、江青在场，聂提出：“解散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辞去校文革主任一职”结果马上召到江青的否决和训斥。聂元梓只好取消退下来的计划。（注3）

聂元梓多次想要解散北大校文革并辞职，她是怎么想的？她在给北京中院的“上述状”中披露了她的“活思想”，她写道“我对文化大革命这么搞法不理解，这局面怎么收拾？”“原来以为军训后，解放干部，学生复课，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了。可这样子越来越糟了。我干不了。”（注4）但她的提议，群众不同意，中央不接受，她是“欲罢不能”、“骑虎难下”。于是她自然地对运动采取了抵制的立场和态度。

## 8、郭罗基的大字报

一月夺权风暴之后，中央文革、《人民日报》频频号召掌了权的群众组织头头，要开展整风，夺头脑中“私”字的权，清除各种不良之风。1967年1月16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批评聂元梓说“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3月3日，郭罗基（哲学系教师、国际饭店会议挨整的老“左派”、原“红旗兵团”骨干）在大饭厅外墙贴出大字报《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立即引起轰动，围观者众。郭的大字报批评聂骄傲自满、文过饰非、官僚作风。批评校文革没有充分依靠从

学生中涌现的闯将。批评聂涂改录音带。要求聂元梓带头整风。看得出郭的大字报出自善意。随后出现许多支持郭罗基的大字报。3月5日，扬子浪贴出支持郭的大字报。但也有些“新北大公社”的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反对郭罗基，说他是“针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是“逆流”。聂元梓没有制止这种压制批评的现象。群众的争论逐渐激烈。这张大字报及尔后校文革展开的整风，引起了各种思想的交锋，为6月北大的重新分裂埋下了又一条伏线。3月6日左右，化学系“新北大公社”“0363”战斗队（队长陈醒迈）贴出海报，倡议校文革开门整风，并在大饭厅多次召开大型串联会，设讲坛，批评校文革，给聂、孙提意见。

3月8日，校文革应群众要求，开门整风，孙蓬一讲话，他自我批评少，为校文革辩解多。令我很不满意。

3月9日中午，扬子浪再次贴出整风大字报《反老孙论献给“反杜林论”的拙劣宣传者孙蓬一》，大字报对孙蓬一对待整风的态度，做了尖锐批评，劝告他“退一步，进二步”。从中午到夜晚，观看此大字报的人群络绎不绝。我挺欣赏这份大字报。但“红梅”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因为觉得局势复杂，同样是整风，但有“桥台”和“补台”两种立场。需警惕校内外反北大的极左势力借机起事。

3月10日前，校文革第二次开门整风，聂、孙做了第二次自我批评，大部分人对他们的检查不满意，出现很多批评他们的大字报。

3月10日，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青贴出大字报，对聂、孙提出批评，批评他们整风不够虚心，缺乏诚意。化学系0363战斗队、陈醒迈，不断召开整风鸣放串联大会，批评校文革和聂、孙，不让过关，我感觉有点揪住不放的意思。而0363的串联大会每次开完后，新北大公社中都有一批被我们称之为“死保派”的战斗队（如历史系“桔子洲”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压制提意见，批评“0363”等提意见者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打击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反校文革逆流”。对0363及其支持者压服的结果，是越压越不服，他们对聂、孙的批评，调门越升越高。我们“红梅”有被夹在中间的感觉，对两个极端的态度都不满意，一方面不赞成0363不断上纲上线；另一方面不赞成“桔子洲”们压制批评，堵塞言路，认为这是为校文革帮倒忙。感到双方都把人民内部问题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方向扯，头脑太热，不理性。

3月下旬，中文系马西沙为“红梅”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夺取政权，保卫政权，巩固政权，发展政权》，论述了反党委、反工作组的夺权过程；论述了击溃“井”、“红”从极左方面攻击校文革、巩固红色政权的意义；而后重点论述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夺权掌权之后，应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需要通过整风来“完善”和“发展”政权；批评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强调对校文革要补台。大字报贴在大饭厅前大字报苇席栏上，大字报很长，从北至南贴了很长一排。从早至晚，观看者众。公社总部刘冲见到我，说“红梅这张大字报写的好，现在缺少正面的批评、引导。”

北大3月的整风波浪，使“新北大公社”出现了一些裂缝，到了6月5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来到北大，看准了裂缝，蓄意投下一颗巨石，要把他所说的北大“一潭死水”，掀起“大风大浪”。从而造成北大的大分裂。整风中的反对派郭罗基、徐运朴、侯汉青、0363战斗队、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等都分裂了出去，成为反校文革派，并与1966年底被击垮、1967年5、6月死灰复燃的部分“井”、“红”骨干和个别人如牛辉林，逐渐在组织上合并。但整风派与原“井、红”始终存在着思想分歧。而支持校文革的一派，也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压制给校文革提意见的死保派“联战”；一派是“66串联会”，“66”

支持校文革，反对分裂，坚持批判校内外的极左思潮，支持聂、孙对吴传启的斗争，但同时继续严肃批评聂、孙的错误，坚持校文革必须继续整风。“66”是“。公社”中的整风派。

#### 9、孙蓬一4·12演讲

1967年4月12日晚，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在北大大饭厅召集全校师生，发表了一个在北大及全北京市影响极大的演说。这个演说代表了新北大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也代表了后来人们所说的北京天派中的新北大派，向后来所说的地派中最左的“学部联队”吴传启及其后台这一派宣战，不点名地向极左派的代表人物王、关、戚宣战，同时尖锐地批评了地院东方红。这个演讲引发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引发了新北大“炮打谢富治”；二是导致了陈伯达于6月5日下重手“修理”新北大和聂元梓。

孙蓬一“4·12”演讲的直接导火索是“4·8民族宫事件”及紧接其后的“4·11”地院“东方红”等六校冲击北大校园事件。下面从“4·8”到“4·11”，再到“4·12”，按顺序做个回顾。

关于“4·8”民族宫事件：4月初时，民族宫有个民族工作展览，造反派要对展览的修正主义民族路线进行批判。当时民委系统两派争夺对展览会的批判权。一派是民研所洪涛、刘郢的“东方红”。学部吴传启、地院“东方红”支持这一派。另一派是民研所“二·七兵团”及民院郑仲兵的“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等19个单位支持这一派。地院“东方红”这一派排斥新北大这一派，要求“二·七兵团”和民院“抗大公社”退出批判展览会的联络委员会。新北大坚决反对。7、8号时，“新北大公社”的学生进入了展览大楼，占据了部分房间和材料。“红梅”的徐森及我们班女生杨桂香在其中。8号，地院“东方红”公开讲要把北大等单位的人从民委大楼赶走。“新北大公社”总部卢平，紧急带领“公社”数力系学生50人赶至民族宫进驻，好友扬子浪也在其中。

4月8日下午5：00，地院“东方红”等地派院校学生包围了民族宫，9日凌晨二点，地院“东方红”等发动夜袭，200多人冲进大楼，把北大同学住的房间玻璃打碎，进入房间抢材料，把北大学生推出屋外，一间房一间房清户，逐个人推出大楼。他们对北大学生喊道：“你们是保守组织，无权批判展览会。”扬子浪在其公开发表的《文革日记》中记述了“4·8事件”，写道“地院‘东方红’等校红卫兵”“他们砸玻璃门窗，大打出手，无所不用其极”，“终于在凌晨3时左右占领了全部房间，抢走了全部材料。”“今晨6时回校”“挨了打，受气，丢了材料。”“洪涛、吴传启、卢正义、徐非光他妈的处处与北大为敌，绝无好下场。”（注5）扬子浪这天日记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是被动挨打被赶走，憋了一肚子气，斯文如扬子浪者，也忍不住在日记中来了句“国骂”。温度骤然升高了。二是扬子浪明确意识到真正的对立面不是“大打出手”的地院“东方红”，而是站在他们后面的吴传启（学部）、洪涛（学部民研所）、卢正义（高教部）等，是这股势力。吴传启的背后是谁？扬子浪可能为着安全，没有写出来。但我们当时一起议论的是，地院后面是林杰，林杰后面有后台，可能是关锋？（对关锋我们只敢怀疑）。地院“东方红”是被人当枪使，但因有所仗恃，因而胆子大，行动野。

紧接着发生了“4·11冲击北大事件”：4月11日下午三点左右，地院“东方红”等六所大学的宣传车，闯入北大校园。除地院外，还有邮电学院、农机学院、工大、农大、民院的群众组织。他们继“4·8民族宫事件”后，不肯罢手，继续挑事，主动攻击新北大。他们六辆宣传车开入北大，车上大喇叭广播：“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

梓必须从红代会滚出去！”、“新北大公社是新保守派！”、“揪出聂元梓的后台！”等。大喇叭的吵声把北大学生都引到楼外校园的马路旁。北大学生把六辆车团团围住。

我当时在场，心里直冒火，他妈的，敢到北大来撒野！于是一跃一攀，我带头首先登上了地院那辆车。二话不说，把连着大喇叭的电线扯了下来，宣传车顿时变哑吧了，北大学生欢呼雷动。有样学样，有些同学登上了其他车，纷纷拔掉电线，六辆车都哑吧了。北大无人动手打人。这时校广播台广播：“北大同学注意，不要动手打外地学生。欢迎外校学生给北大校文革提意见。外校同学这样来北大闹事是不对的。请外校学生离开北大。北大同学把校门打开，让他们出去！”晚6时左右，胡宗式（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负责校外活动）带着许多人把六辆车推出了校门。地院等校的宣传车离开了，但北大师生激愤难平。接着便发生了孙蓬一的演讲。

关于“4·12孙蓬一演讲”，孙蓬一演讲的直接导火线，就是“4·8”和“4·11”两个接连发生的事件。4月12日晚8：30左右，孙蓬一（校文革副主任）在大饭厅招集全校师生大会。大饭厅被挤的水泄不通，人头涌动，红旗招展。孙蓬一登台演讲，慷慨激昂，话语流畅，铿锵有力，不时被几千人的欢呼打断，持续约一个半小时。

下面摘录孙蓬一“4·12演讲”的关键话语：“昨天、今天，我们新北大上上下下，一切革命同志，万众一心，斗志昂扬的气概就可以给企图搞垮新北大那些人一记响亮耳光！”“我们绝不想干涉兄弟单位内部的事情，但是你们既然打到我们家门上来了，一些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据我们所知，现正充当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充当一个反我们新北大公社红色革命政权的打手的急先锋们就是朱成昭的势力、朱成昭的残余的力量。”“他们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为了独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就不惜破坏大联合。”“目前的这场斗争，既然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无产阶级江山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因此什么‘委曲求全’呀，什么‘忍辱负重’呀，让其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只能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他们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真正的‘摘桃派’”“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他们里面查明了叛徒，起码有五个。”“例如卢正义。”（孙的“4·12”演讲，全文刊登在4月13日《新北大》校刊，。这个讲话点了吴传启的名，并指出有人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句话的矛头就是指向了王关戚。这个讲话对了解北大1967年的历史及当时北京的两派斗争十分重要。故以上做了较多的摘录。）

对于当年孙蓬一敢于冒着巨大风险，带领我们“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坚决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反极左思潮，保周，我始终由衷地敬佩，并认为历史应对孙蓬一的英雄行为给予正确的评价。但对他的缺点、错误，我也同样认为不能回避。

4月13日，谢富治在人大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解决“4·11”北大与地院的冲突。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胡宗式参加了会议。在接见会上，谢富治表面公允，不让北大和地院讲话，却让随地院到北大闹事的其他五个院校发言，结果北大成了挨批对象，被诬指“挑起武斗”。这明显不公平且颠倒是非。谢富治甚至单独对聂元梓讲“武斗是北大挑起来的。”消息传出来，北大师生议论纷纷，明明是地院等六校跑到北大校园闹事，并不是北大去了地院啊。怎么把责任推到北大头上？再说，北大也没人动手打人呀。那有这么不顾是非，拉偏架，选边站，偏帮地院的呀。这不是拉一派打一派嘛！13号晚北大学生聚集在大饭厅，孙蓬一发表了即席讲话，说谢富治处理不公正。许多北大学生对谢不满，许多人自动

跑到市内贴大标语“炮轰谢富治！”等。还有一批人去公安部要和谢富治“讲理”。聂元梓听说后，赶紧派人去盖掉前面人贴的谢富治的标语（难免有漏掉的），同时派人去公安部去找谢富治“讲理”的学生拦住，劝回学校。这就是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第一次炮打谢富治的情景。当时“红梅”没动，觉得当时公开炮打谢富治太不策略，北京市革委会马上就要成立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已任命谢为市革委会主任。4月13日下午，聂元梓、孙蓬一在小范围议论，“看来谢富治和王、关、戚是一伙的。”（注6）

过了几天我回家，在北京景山学校当英语老师的王瑞和几个弟妹告诉我，前门城楼上有大标语“新北大岿然不动”，大街上还有新北大贴的“谢富治算老几？”、“打倒谢富治！”、“炮轰谢富治！”，问我怎么回事？可见“4·12”、“4·13”事件动静之大。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宣告成立。主任：谢富治，四个副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

#### 10、反极左，反吴传启

5月时，“红梅”在“新北大公社”中经常和几个战斗队及好友进行交流，有“横扫千军”（跨系）、“东方红”（中文系）、“0763”（中文系）、“红色清道夫”（历史系）等，另外有些个人如任瑚琏（中文系）、孟关霖（物理系）、李长啸（经济系）等。当时大家有了明确的斗争目标，认为主要危险是极左路线及极左思潮。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第一线人物是“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吴传启，第二线人物是林杰，第三线人物是林杰的头台（怀疑关锋）。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的思想偏左，被极左派当枪使了。我们斗争纲领就是反极左，斗争策略就是先打吴传启。吴传启是他们的一个敏感枢纽，也是他们的弱点。一打吴传启，那个极左阵营的上下前后都震动，都有反应。

从3月开始，北京市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一些高等院校如农大、农机、人大、北外、石油学院等学校的一些组织（后来被称为地派），提出了打倒几个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陈毅、余秋里的口号，出现了揪斗几个副总理的风潮。与之对立，另外一些高校组织（后来被称为天派）则只“炮轰”，不“打倒”。“新北大公社”支持“炮轰”派，反对“打倒”。我们几个战斗队当时认为，要打倒几个副总理的风潮，是“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其要害是要打倒周总理。如果把周恩来的所有助手都打倒了，周恩来怎能独善其身？而总理如果倒了，国将不国，陷入深渊。因此必须保周，这是我们的又一个纲领。当时从地派流传出一个理论，说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所谓旧政府就是几位副总理，总后台是周恩来，代表了旧的国家机器，应该砸烂，由新文革取而代之。我们认为这是典型的极左思潮，对文革、对国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必须与之划清界线并坚决斗争。

6月1日，“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用大字报公布了第一批吴传启的资料，把北京反吴传启的斗争引向深入。

“除隐患”战斗队的队长是哲学系年轻教师赵建文。这个战斗队直属聂元梓领导，任务是调查北京的那些形左实右的代表人物，调查他们怎样破坏文革，调查他们的历史，挖叛徒。他们是秘密部队，是一支精干的调查队伍，向中央文革和周恩来递交调查报告。那时我和索世晖经常与赵建文见面聊天，赵的嘴挺严，什么也不透露。后来得知，在5月时，聂元梓、孙蓬一、赵建文已认定“隐患”就是吴传启及其后台王、关、戚。他们已向中央递交了潘梓年、吴传启、卢正义、洪涛等人的材料。向上递交的材料到吴传启为止，更大人物的材

料没敢整理、上呈。而我们“红梅”战斗队做为群众当时只认定了吴传启、林杰是“隐患”，往上只怀疑到关锋为止，再往上就不敢想了。我曾于2016年5月2日拜访赵建文，询问他在1967年9月1日王力、关锋倒后前，“除隐患”战斗队整理并向中央上报的材料中，有没有吴传启以上极左派大人物的材料？他明确告诉我，没有上报过王、关、戚的材料，但整理和上报了谢富治的材料，包括他在市革委会重用周景方那帮人，结党营私的材料。

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北航“红旗”韩爱晶在2月至4月这段时间对“新北大公社”聂元梓、民院“抗大公社”郑仲兵等反学部吴传启、洪涛，是持观望态度。到了5月，老蒯、韩爱晶也加入到攻打吴传启的行动。其实后来人们所谓的“天派”、“地派”并不是阵线很清楚的两派，地院“东方红”王大宾只是左了一些，被人当枪使了。真正对立的兩派，一派是“学部”、一派是“新北大”（当时普遍的口头叫法）。“学部”这派有吴传启控制的学部“红卫兵联队”、洪涛控制的民研所“红色联络站”、卢正义控制的教育部“延安公社”、谭厚兰控制的“北京师大井冈山”。他们听命于《红旗》的林杰。这个圈子的行动相当一致，口号、行动都很左，有强烈的排他性。他们到处伸手抢权。一旦有什么冲突，王、关、戚便以中央文革名义出面支持他们。新北大这派有：北大校文革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人民日报“井冈山”和王若水、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阮铭、民族学院“抗大公社”和郑仲兵以及石油学院的“大庆公社”、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公社”、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红鹰兵团”、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公社”等。这派的共同特点是：反极左，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对谢富治强烈不满，对“二月逆流”的几个副总理“一批二保”，反对打倒。坚决保周（周恩来）。新北大成了反极左、反王、关、戚的中心。新北大得到了军队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派”对立面）的支持，聂元梓与高等军事学院的“红高联”有密切联系。新北大派在5月一发动反学部吴传启的攻势（此时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参加了进来），极左派就全线震动，王、关、戚便被逼到前台施压，施压无效，重量级人物终于出马，陈伯达在6月5日针对北大二次讲话，挑动北大分裂，以阻止新北大反吴传启、反极左。这便是1967年上半年北京两派斗争的全局概况。

（未完待续）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